

中華名著

迟双明 主编

上
下
五
千
年

卷
四

光明日报出版社



A1002108

· 史 ·

宣德三年(1428年),因兀良哈三卫多次侵扰边境,明宣宗朱瞻基督师亲征,进兵喜峰口,在宽河(今河北宽城)大破兀良哈军。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下令将开平卫南移三百里,迁至独石堡(今河北赤城北)。这一措施虽收缩了防线,但也丧失了龙冈、滦河等险要之地。

宣德九年(1434年),蒙古瓦剌部崛起。瓦剌首领脱欢拉拢兀良哈各部。正统二年(1437年),福余卫酋长阿鲁歹攻掠独石堡等处,被明军击溃。正统四年(1439年),福余卫都指挥使歹都一再提出朝廷赐赏太少,互市无利可图。英宗对此置之不理,不久(兀良哈)又以勾结瓦剌的罪名,停止朝贡。此后,明朝与兀良哈的关系公开恶化。兀良哈一再进攻明朝边境。正统九年(1444年),英宗命成国公朱勇率20万大军出塞,分兵四路进攻兀良哈。兀良哈受挫之后,怨恨更深,决心依靠瓦剌,充当其进攻明朝的向导。正统十四年(1449年),兀良哈指引瓦剌也先大军突破长城,在土木堡俘虏英宗,直逼北京。土木之变后,明朝停止了与兀良哈三卫的互市。此后,兀良哈三卫时而遣使要求恢复朝贡、互市,时而派兵侵扰明朝边境,成为明中叶时东北地区的一大祸患。

二十二、朱棣亲征

元朝残余势力被逐出中原后,仍然雄踞漠北,势力强大。明太祖曾多次派兵进攻北元残余,终于促使北元分裂,东部兀良哈归附明朝,中部鞑靼和西部瓦剌仍然与明朝为敌。尤其是鞑靼仍沿袭元朝帝号,势力最为强大。永乐元年(1403年),鞑靼别部首领鬼力赤杀死北元皇帝坤帖木儿,自立为可汗,不再沿用元朝国号、帝号。同时,与瓦剌相互仇杀,使蒙古势力大为削弱。鬼力赤等各部首领纷纷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

永乐四年(1406年),鞑靼太保、知院阿鲁台杀死鬼力赤,迎立元宗室本雅失里为可汗。阿鲁台自任太师,一面继续与瓦剌为敌,一面断绝与明朝的关系。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本雅失里、阿鲁台杀害明朝使节郭骥。明成祖朱棣为控制鞑靼,于五月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秀李罗为安乐王。然后在七月任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十万大军讨伐本雅失里、

· 史 ·

阿鲁台。由于丘福轻敌冒进，率领千余骑兵渡过胪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结果落入鞑靼重兵埋伏之中。丘福全军覆没。

消息传到京师，成祖大怒，认为如不及早除去北方鞑靼这个祸患，边疆将永无宁日，于是决定亲自率军北征。同年十月，成祖下令户部尚书夏原吉筹备北征的军需粮草。夏原吉按成祖的意图，准备了3万辆车辆和20万石粮食。拟跟在大军的后面，每隔十天的路程就建一座贮粮城，以备大军回师时食用。

永乐八年（1410年）正月，成祖发动了第一次北征。率50万大军出塞，五月初一，明军到胪朐河。前锋与鞑靼游骑交战，获得小胜。初八，明军从俘虏口中得知本雅失里在兀古儿札河（今蒙古乌勒扎河）。成祖亲率精兵，携带20日粮草，长途奔袭敌军大战。十二日，明军到达兀古儿札河，本雅失里仓皇逃走。第二天，明军追到斡难河，与本雅失里在这里展开了激战。成祖亲自指挥冲锋，一鼓作气，打垮了本雅失里。本雅失里丢下所有辎重，只率七骑人马渡河逃走。

六月，明军在回师途中的阔滦海子（今内蒙古呼伦湖）附近与阿鲁台遭遇。成祖亲率骑兵冲入敌阵，杀声震天，阿鲁台大败而逃。明军追击一百余里，斩杀百余人，因天热缺水而收兵回营。阿鲁台虽受重创，但仍派出小股骑兵尾随明军之后，袭扰明军的后卫。成祖便亲自率一千余名精兵前去断后，在途中设下埋伏，痛歼了尾随的鞑靼兵，使其不敢再来侵扰。摆脱了敌人的追随，但是明军又面临着严重的缺粮问题。成祖一面拿出自己节省的一部分口粮分给士卒，一面下令携带粮食多部队的借给缺粮士兵，回京后给予加倍偿还。七月，成祖回到北京。

阿鲁台战败之后，于永乐九年（1411年）十二月派遣使节求和，并请求让他管理女真、里巴为可汗，实际上将大权握在自己手中。阿鲁台被瓦剌打败之后，逃到明边塞附近，向明朝纳贡称臣，请求明朝出兵为本雅失里报仇。明成祖知道阿鲁台是走到穷途末路才来投降的，并非心悦诚服，但仍接受了阿鲁台的朝贡，封他为和宁王。这样一来，马哈木怨恨明朝收容阿鲁台，不再向明朝进贡。

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成祖下令进行第二次北征，命安远侯柳升等率五十万大军随同出征。三月，成祖离京。四月，全军出塞。马哈木终因抵挡

·史·

不住明军的攻击，开始撤退。明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土刺河边。马哈木连夜向北逃遁跑。直到深夜，成祖才回到帐中。成祖考虑自身损失也较大，不宜再战，便下令班师回朝。去回师途中，又击退了瓦剌的袭扰，于八月回到北京。

忽兰忽失温一战，瓦剌元气大伤。永乐十三年（1415年）十月，马哈木派遣使节向明朝谢罪，进贡马匹。两年之后，马哈木去世，明朝让他的儿子脱欢继承爵位。

阿鲁台的势力日益强大之后，常常侮辱明朝使节，甚至派兵侵扰明朝边境。永乐二十年（1422年）年初，阿鲁台大举进攻兴和（今河北张北），杀死明将王祥。成祖决心举行第三次亲征。同年三月，成祖率大军离京。阿鲁台闻风而逃。五月，明军大举出塞。在这一形势下，鞑靼各部纷纷叛离阿鲁台。阿鲁台见势不妙，匆忙将牛马驼羊等辎重丢在阔滦海子，携家属北逃。明军收容鞑靼部众，班师回朝。回师途中，分出一支精兵突袭兀良哈，大获全胜。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七月，成祖听说阿鲁台又要侵犯边境，决心进行第四次亲征。九月，成祖到达沙城（今河北张北西北），从前来投降的鞑靼首领阿失帖木儿等人口中得知阿鲁台刚被瓦剌打败，不会有南下的意图。但成祖仍率大军到达胪朐河附近，接受了鞑靼王子也先的归降，然后班师回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阿鲁台率兵进攻大同。四月，成祖离京，进行第五次北征。六月，明军到达答兰纳木儿河一带（今内蒙古伊尔施西南中蒙边境地区），分兵搜索，没有看见阿鲁台踪影。成祖担心粮草接济不上，于是决定班师。七月，成祖病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在榆木川军中。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

二十三、唐赛儿起义

明朝初年，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但农民起义仍时有发生。在这些起义中，影响较大的是唐赛儿起义。

唐赛儿是山东蒲台（今山东滨县南）平民林三的妻子。她是白莲教信徒，自称“佛母”，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在益都、诸城、安丘、莒州（今山东莒县）、即

·史·

墨、寿光等地汇聚了数万教徒。永乐年间，明朝营建北京和北征鞑靼都需要从南方运送大批粮食北上，为此开凿了会通河，重新使用大运河运送粮食。为了这些工程在山东先后征调了几十万民夫，沉重的徭役激化了这一地区的社会阶级矛盾。唐赛儿率董彦杲等500人发动了起义，占领了益都卸石棚寨。

唐赛儿起义后，青州卫指挥使高凤率兵进行剿杀，被义军杀得几乎全军覆没。山东布政使都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派人前往招抚。唐赛儿杀死使者，拒绝投降，并派义军将领宾鸿、董彦杲等人分头攻占莒州、即墨等地。所到之处，焚毁官衙，诛杀贪官污吏，大批教徒和民众纷纷响应起义。

明成祖看到唐赛儿的势力越来越大，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二月命安远侯柳升率兵围剿唐赛儿。同月，柳升大军包围了卸石棚寨，而此时唐赛儿义军的主力正在进攻安丘、诸城等地兵力空虚。守卫大寨的义军进行顽强抵抗，后来终于支持不住。董彦杲出面向明军假降，并说大寨已经断水断粮，饥渴难耐。柳升中计，将明军主力布置在寨东取水的道路上。当夜，唐赛儿等率义军从寨西突围。在突围当中，击毙了明军指挥刘忠等人。柳升急忙调兵遣将追击义军，俘虏了唐赛儿、刘峻等百余人。

这时，义军首领宾鸿也在围攻安丘时失利。起初，宾鸿处于优势，杀得官军龟缩城中不敢出来。不料，明备倭都指挥卫青率千余精兵昼夜兼程，突然到达安丘城下。城内外明军两面夹攻，宾鸿义军牺牲两千余人，不得不撤退。后来，义军终于被官军镇压下去。攻打诸城的义军也全部阵亡。唐赛儿起义失败。

唐赛儿被俘后，被关在囚车之中（一说关在监牢里）。虽然在官府的严密关押之下，唐赛儿竟逃脱而去。明成祖听说唐赛儿脱逃，并再也没有抓到的消息，十分震怒。将柳升等文武官员关入监狱。柳升因为战功显赫，幸免一死。山东右布政使秦挺等人大多被处死。

二十四、治理漕运

明代自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由于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重心相距甚

·史·

远，因此政府而对连结二者的漕运极为重视。

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命平江伯陈瑄兼督长江、淮河、黄河和卫河之漕粮转运。明初承袭元朝旧制，仍以海运为主。洪武间，张赫、朱寿均自海上岁运粮70万石，供应辽东驻防军食，皆被分别晋封为航海侯和舳舻(音zhúlú)侯；永乐初，陈瑄任总兵时，也曾率领舟师海运米岁百万石，补充北京军储，建百万仓于直沽伊儿湾，修天津卫城池，驻兵万人戍守。至此，开始下诏令以后江南漕米，一部分仍由海运；另一部分则由淮河入黄河，至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再陆运到卫辉，经卫河转白河达通州。是为海陆兼运的开始。

永乐八年(1410年)，明政府扩大漕运规模，由每年运送250万石增至300万石，为满足国用。特令江、浙、湖广三省布政使和都指挥使，必须亲自负责督运。为适应漕运规模的扩大，从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二十八日起，又开始大规模整治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之关键地段——会通河。该河开始凿于元至元二十六年至泰安二年(1289年至1325年)，北起山东临清州(今山东省临清县)，南至江苏淮安府之邳州(今江苏省邳县)，全长450余里。六月，会通河开浚完工。以汶水、泗水为源。特建天井闸使其分流：往南直通淮水，往北则顺其西侧新开河道经东昌至临清，全长385里。从济宁至临清间，又置闸15道，根据时间启闭，以调节水量。为保证会通河水量充足，宋礼在宁阳置堽城坝，遏制汶水改道，使其水尽入新开浚的河道。宋礼回京回旨时，又提议修治汶河支流沙河。朝廷当即批准了他的建议。

永乐十年(1412年)正月，因巡按山东御史许堪反映，去年卫河泛滥，河岸倒塌，朝廷派宋礼处理此事。宋礼治理漕河中，很注意发现和起用人才。如工部主事蔺芳，建议将维护新筑堤岸的埽座原料，由蒲绳泥草改为木编大囤，置水中后以木桩钉牢，囤内填满石块，各桩间连以横木，用以牢固堤岸，“则水可以杀，堤可以固，而河患息。”宋礼深为赏识，特破格提拔为工部右侍郎，予以重用。十一月，陈瑄负责开浚镇江的京口、新港和甘露三港，使漕船直达于长江。

永乐十三年(1415年)三月，明朝决定取掉海运，全行河运。下令平江伯陈瑄在湖广、江西等地造平底浅船3000艘，以充漕舟，每年运粮300余万石。原先运京漕船到达淮安，必须坝渡淮才能到达清河，转输非常困难。陈瑄采纳当地老人建议，开凿清江浦引黄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到淮河。又在管家湖

·史·

筑堤十里，以便引舟。沿河设立移风、清江、福兴和新庄四闸，按时启闭，使漕舟顺利通过。浚仪真、瓜州漕道通湖。凿吕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势。开道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筑高邮湖堤，堤内凿渠达四十里。同时依傍淮水修常盈仓五十区，以贮备江南税粮。在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等地广建仓库，以便转输。原给太仓的岁粮正式分工为：苏州并山东兗州粮送济宁仓，河南、山东粮送临清仓。然后由浙江并南直隶卫官军负责从淮安送至徐州；继由京卫官军接运至德州；再由山东、河南官军接运至通州。这种分段运输，称为支运法，每年四次。又在河道淤浅处，濒河建房舍368所，驻以浅夫负责疏导。在船行处边缘河岸凿井植树，以便行人。至此会通河全线畅通，海运遂罢。

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政府在淮安府清河、福兴，徐州府沽头、金钩和山东省谷城、鲁桥诸闸分别置以闸官，加强管理，以确保漕船顺利直达通州。

总之，此期间凡漕渠在齐鲁间者，宋礼功绩卓越；而陈瑄在江河边是成绩显著。

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因支运法行之已久，人民都苦于往返文耽误农时。因此陈瑄建议，令人民只运淮安、瓜洲，然后兑与卫所，由官军直接运到京，只加给运军一定数额的路费耗米，称兑运法。

英宗正统间，江南巡抚周忱经理运道，在江苏武进设奔牛、吕城坝闸，使漕舟得以从京口直出长江，异常便利。后坝闸渐毁，水道积淤日战。天顺中，巡抚崔恭清求准盾按照周忱故道重加整理，增设五闸，至成化四年（1468年）完成。

成化七年（1471年），改“兑运”为“改兑”，即所有漕粮均由官军径直运往京师，故又称“长运法。”它规定：徐州、济宁、临清、德州四仓所有支运漕粮，都兑与各附近水次运军，只在原耗米外另加适量脚米。并在临清、德州储存部分“预备米”，用于漕粮缺少时给予拔补。正式谕定，每年黄、淮以南运米400万石以供京师；以北运粮800万石以供边防。漕运折耗，分为米、银两种，米备远运或显加文耗；银备雇佣铺垫之费，以保足额。孝宗弘治时，定折耗银名轻齐银，由官府拨给，正额外所有羡余均归漕卒，故“军卒饶逸”，漕运兴盛，然而官员天利可图。后经漕抚李蕙奏请，一度将“齐余贮库，听来年缺者贷偿”。但到嘉靖初，则又经河漕总兵杨宏、大学士费宏先后乞请，轻齐银仍给漕军。直至

· 史 ·

嘉靖七年(1528年),通惠河成,粮运从河入,节省轻齐银11万两,朝廷开始下令只给运军三分之一,三年后则酌情减少以宽民力。从而保证了有明一代漕运的畅通和明政权的巩固。正所谓“安危之势易明,内外之形易判。”

二十五、江南治水

在明代,天下之赋,半出于江南。特别是苏州、松江、常熟、嘉兴和湖州等诸州府,更是当时全国最主要的产粮基地而江南之田,以水田为主。故统治者对江南的水利兴修,极为重视。

明初,苏、松、嘉、湖、常诸州郡,多年以来水患严重,但多次建设有司督治无效。故早在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成祖即位不久,便任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为总指挥,前往此地治理水患。他主张,先浚吴淞江南北两岸安平(一说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诸水入刘家河和白茆河,使之直注长江或大海。并根据当地地势,各置石闸,根据时节启闭,每年当水干涸时,加修圩岸,以防御暴流。这一建议,当即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征发民夫十余万,奋力施工。夏原吉本人更身体力行,布衣徒步,日夜策划,奔波在工地上。他一方面,将吴淞江水,经昆山夏驾浦引入刘家河,转归大海;另一方面,开浚北面的白茆河,导吴淞江水注入长江,转归大海。这样,不仅能直接纳导太湖之水,顺利出海,使自吴江经长洲、昆山、华亭、嘉定、上海,沿途广大地区的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而且也解除了自常熟至无锡、长洲、昆山交界处低洼农田的水患,效果非常显著。同时,夏原吉又领导修治了刘家河。最后,夏原吉对白茆河也进行了重大的修治。白茆河,又叫白茆塘,白茆港,白茆浦,在常熟县境。白茆河通,则太湖定,而常熟安;白茆河塞,则诸水皆无处泄,而常熟必定成了沼泽之国,太湖也将泛滥。有鉴于此,夏原吉又特修了吴淞江南北两岸的港浦,分引诸水入刘家河与白茆河。从此,该地的水患彻底被解决。

总之,夏原吉以吴淞江、刘家河与白茆河等三江,尽泄太湖所上游之水;同时又广开分支,共受此三江之水。三江既然能安全入海,则江南水患基本可除。

· 史 ·

但是，夏原吉对以上三条河的治理并不彻底。由于只做到了“浚其流，而未开其源。其效果显在当时，而不能持久。到明宣宗宣德七年（1432年）便因年久淤塞，又是遇雨成灾，田禾尽溺。幸有苏州知府况钟奏准，于正统六年（1441年）朝廷派遣工部侍郎周忱况钟一起，主持修治吴淞江与白茆河。此后还有景泰五年（1454年）李侍郎李敏奏准，修浚白茆河，挑青墩浦、横沥塘以通白茆之流。天顺二年（1458年），则有巡抚崔恭浚大盈浦以通吴淞江。成化四年（1468年），巡抚史毕亨浚修吴淞江夏驾浦至嘉定徐公浦段130余里。弘治四年（1491年），侍郎徐貫修治刘家河自太仓至嘉定外冈段18里。弘治七年（1494年），右副都御史何鉴在整理税粮的同时，曾以工贷赈，征民五万，主持修浚吴淞江和白茆河。正德十六年（1521年），工部尚书李充嗣奉命发民夫60余万，修白茆河自常熟东仓至双庙段故道13820余丈，改凿自双庙至海口的新河道3550余丈。第二年（嘉靖元年），在故道旁凿新河，以避涨沙堵塞海口。又浚吴淞江自夏驾口至旧江口段。从而使吴中地区二十余年无水旱之忧，连年获得大丰收。隆庆四年（1570年），苏松大饥，都御史海瑞推广寓赈济于兴作的办法，以工代赈，大举修治吴淞江。两个月时间，便将自上海南跄口至嘉定黄渡六十里的平陆，开成新江。不仅工程迅速完成，而且广大饥民也得到饱食，深受人民欢迎。但是，自万历十五年（1578年）以后，由于朝政腐败，用人不当，虽然每年用工数以万计，费帑金十余万两，但总是“开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即尽为平壤”，直到明朝灭亡，均是水旱连年，饥民遍野。

二十六、皇陵之变

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朱高煦，生来狡诈，多智谋，好习武艺，善于骑马射箭。朱棣起兵时，借清君侧为名，夺取帝位，朱高煦响应从征，多立战功，曾受到其父朱棣的赏识。朱棣夺得帝位，成为皇帝后，在决定立太子时，却以应立长子为理由，立朱高炽为皇太子，而封朱高煦为汉王，在云南建立汉国。由此朱高煦对其父明成祖朱棣很是不满。

皇太子朱高炽性情仁厚，爱好经史，而朱高煦却不喜欢学文，爱好武功，与

·史·

朱棣有些相似。朱棣每次北征蒙古，都有朱高煦跟随前往。

其后，朱高煦日夜思量如何夺取皇太子之位。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棣将他改为封国青州，他借故拖延上奏，希望留在皇帝左右，朱棣拒绝了他的请求。永乐十五年（1417年），汉王朱高煦因图谋不轨，被安置在山东乐安州。但是，朱高煦仍不悔改，在他的府中私属的军士三千多人，这些军士不归兵部管辖；大臣杨士奇认为他既不肯就封云南，又不肯去青州，而且在得知朝廷将迁都北京之后，自己又想留在南京，心怀叵测，建议朱棣及早处理，以绝后患。朱棣在得知朱高煦私造兵器收养亡命之徒、造船、教练水战等情况，大为恼怒，把朱高煦禁闭在西华门内，准备惩处，皇太子朱高炽却尽力救护，朱棣仍将他安置于乐安州。朱高煦到乐安州，十分怨恨，谋位之心更加强烈。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病死，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八月，将朱高煦召到北京。洪熙元年（1425年），派汉王朱高煦之子朱瞻圻到凤阳看守皇陵。五月，仁宗病死，皇太子朱瞻基继皇位，朱高煦向他提出了利国安民的四项建议。朱瞻基（明宣宗）对侍臣说，汉王朱高煦这次是出于诚心，说明他有心改过，所建议不可不听。于是下令政府予以施行。

但朱高煦谋反夺位的野心，始终没有改变。明宣宗朱瞻基登位以后，对朱高煦十分优待，但这样不但没能感化他放弃夺位的野心，反而助长了他反叛的念头。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正式谋反。他派枚青私到北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但张辅却将枚青逮捕，并向明宣宗奏报此事。他又拨动山东都指挥靳荣等在济南叛变，以作为应援。朱高煦谋叛，私设五军都府，分为前、后、中、左、右各军，派他的四个儿子各监一军，朱高煦亲领中军，准备向北京进军。

明朝廷作出征讨叛王朱高煦的部署，随后宣布朱高煦的罪行，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并下诏亲征，明宣宗率京营五军将士从北京出发。在途中，明宣宗诏谕朱高煦，劝他投降。十二天以后，亲征大军到达乐安城北。明廷大军四面包围乐安城，朱高煦仍然令部下乘城举炮，攻城大军发神机铳箭，声震如雷，城中人皆惊慌。将领们要求攻城，明宣宗没有答应，仍再次致书劝朱高煦投降。在大军夺城的情况下，乐安城中许多人想将朱高煦捆起来献给明宣宗。朱高煦十分恐慌，派人到明军部表示愿意归降、请罪。高煦出来拜见明宣宗，

大臣们都请求将他处死，明宣宗没有接受大臣们的建议，随即撤军回京，将朱高煦父子及同谋反叛的文武官僚一同押解到北京下狱。

明宣宗回北京后，亲自撰写《东征记》，详细叙述了朱高煦叛变及朝廷用兵征讨的始末，发给群臣阅览。最后将朱高煦拘禁起来看管，其同谋文武官员640多人处死刑，另有1500多人由于故意纵容、藏匿参与者等行为处死或发配边疆，发往口外的还有727人。

二十七、刘六刘七起义

明中叶以来，朝政开始趋于腐败，特别是武宗正德年间，大宦官刘瑾独断专行，专恣骄横。京师之南霸州、文安、固安、永清一带，都属明顺天府之辖境，京卫周围军屯密布，沃田良地都被皇帝、大官僚、军队卫所霸占，使得这一带尽是皇庄、官庄，在剧烈的土地兼并残酷的剥削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统治者还用“代官养马”剥削人民，甚至直接把人民群众的马匹攫为己有，广大贫苦人民无法忍受，他们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以刘六、刘七为首的京师南部农民起义就是代表。

刘七名宠，刘七名宸，兄弟二人是顺天府文安县人。自幼骁悍，擅长骑射，以侠义闻名京南文安、霸县一带。

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刘六、刘七等在霸州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明朝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仅仅几个月，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大宦官刘瑾想尽管除去这个祸患，分别派遣御史宁果赴前往定，殷毅去天津，薛凤鸣驻淮阳，专门镇压起义。

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刘六、刘七再度起义。

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刘六、刘七聚众攻打安肃县，劫走了早已被捉的起义首领齐彦名。当时广大农民纷纷响应，旬日之间，聚众至数千，抢掠攻击畿南诸县。刘六弟兄攻夺文安县，起义队伍发展十分迅速，自畿南到山东，倏忽来去，势如风雨。就是没有起义的农民，也十分拥护起义军，“所过乡落，莫不椎牛供具，甚至为之持门屏以遮矢石，为向导以攻州县”；“凡过之处，则乐于

· 史 ·

供给，粮草器仗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明廷乃命指挥同知李瑾统率京营千人前往镇压。

三月，起义队伍进攻博野、饶阳、南宫、无极、东明等县，进入深州、冀州、定州、祁州、开州之境，展形大肆杀掠。滨州、临朐、临淄、昌乐、日照、蒲台、武城，阳信、曲阜及泰安州，均被攻陷。起义队伍人多兵强，而且进行突袭，而官军单弱，李瑾之官军东西奔命，势不能支。吏部尚书杨一清建议推用大将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军务。武宗遂命惠安伯张伟充任总兵官，召马中锡为右都御史，提督军务，统率京营兵以镇压起义者。五月，兵部尚书何鉴遣都督黄琮、张俊统兵布防于霸州等地。

六月，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赵𬭼、刘三、邢老虎、杨虎等率领，从霸州出发，首先攻入山西，再由山西攻入河南，自西而东，踰曲周、威县，直抵文安，后又往河间，泊头、庆云。最后同刘六、刘七会师，回到霸州。另一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等率领，自畿辅下山东、河南，攻入湖广，直抵江西，仍由故道入长清、齐河等县，直抵霸州，同赵𬭼等在霸州会师。最后又往山东走，向东南下江为绝地。农民军所经之地纵横数千里，所过如无人之境，接连攻下山东、河北等二十余州县。时右都御史马中锡和总兵官张伟所率领的京营兵马，根本无力镇压义军，马中锡系书生，想招抚起义军。而张伟系纨绔子，胆怯而不敢战。马中锡在各条道上帖满檄文，榜示刘六等经过，所在官司不许捕获，与供饮食。马中锡至徐州桑儿园驻兵，单车从士卒仅数人至刘六营垒前，开导其“自新”。刘六等前来拜见，马中锡真诚的进行劝抚。但明廷宦官掌权，无招降之意。起义军遂益肆攻伐掠劫，聚众至数万。马中锡故城县人，起义军戒令所过故城勿焚劫马中锡家。由于起义军对官军的瓦解分化，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兵部尚书何鉴认为马中锡“玩寇殃民”，（张）伟拥兵自卫，“纵贼不战”，逮下锦衣卫论死。

八月，刘六、刘七、齐彦名、杨虎等合兵，动用 2000 骑兵，强攻橐强县，杀死知县段豸等，明廷任伏羌伯毛锐充任总兵官，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大肆征兵以镇压起义军。刘七等在沧州不能进克，进抵霸州、信安镇，又至固安，明统治集团立即下令北京戒严。武宗慌恐不安，把宣府，延绥边兵也调到北京，加强防卫。

· 史 ·

十月，刘六等自沧州解围后向南进兵，连续攻破日照、海丰、寿张、阳谷、丘、宁阳、曲阜、沂水、泗水和费十城。接着进攻济宁，没有攻下后，焚运船1200艘，捕捉工部主事王宠，气势日益旺盛。

十一月，赵𬭼率所部到达宿迁。淮迁知府刘祥率兵迎战，不战自溃，溺死者无数，连刘祥本人也被俘。时杨虎率壮士在黄宁渡河，被官军将其舟击覆，杨虎溺水而死。赵𬭼推刘三为主，统领杨虎所部。起义军中一致推荐刘三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𬭼称副元帅，小张永前军，管四后军，刘资左军，马武右军，邢老虎中军，并称都督。军分28营，应天上28宿，各树大旗为号。置金旗二，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金开溷沌之天。”又造钩牌，令所至之处，官吏修道路桥梁，备足粮食酒肉以供军士，降者秋毫无犯，拒者斩草除根。起义队伍为之一振。

刘六等人率领起义军的一支从河北打到山东、江苏，又从江苏打回霸州。起义军领袖们计划在十二月初一日，乘明武宗到天坛祭祀时，借机杀死这个只会淫乐的皇帝。不慎计划泄露。农民军很快就探知了这一消息，主动放弃了突袭计划。

十二月，刘六等向西奔，攻克新城、雄县、定兴、安肃、易州、涞水，转而向南，破高阳、蠡县、博野、容城、深泽、束鹿、探知祁州防备较严，乃迂道攻临城、高邑、成安、饶阳，由真定掠赵州、安平，直抵晋州，藁城，柏乡、内丘、南河、衡水等地。何鑑想起义军不东向临清，必南奔彰德，命陆督军分道追袭。至彰德，起义军闻官军至，望风而逃。许泰、冯祯等追战，农民军受损惨重。刘七等纠众万余，继续同官军对抗。刘六、刘七、齐彦名、刘三、赵𬭼邢老虎等又分到攻山东、河南，想牵制官军，其攻势更猛烈。

正德七年（1512年）一月八日，刘六、刘七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又一次攻入霸州，明统治者又一次急忙在北京戒严。武宗一面下诏，调提督军务陆、总兵毛锐带兵到北京，加强防卫。一面布兵于草桥、羊角房和芦沟桥等地。官军加紧对农民军追击，命都御史鼓泽、咸宁伯仇越镇压河南方面的农民起义军。四月，农民起义军在山东嵩浅坡、古县集被十余万明军包围，起义军被杀者有2300人，伤3000余，俘百余人，情况十分危急，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骁骑300余名进行突围，突围成功后。紧接着北上河北，又迅速地组织起大批农民起义

· 史 ·

军，打回老家霸州，攻下香河、玉田、宝坻等县，将明军打得大败。在武清县八里庄打死明军参政王果，消灭宁果军队，再一次震动了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可惜刘六、刘七起义军没有直捣北京，却南赴河南支援那里的起义军，但此时河南方面的农民军已被明军打败，增援虽到，已无济于事。他们只好孤军作战，从此，农民起义军的力量逐渐衰落，最后在明军强大的攻势下，全部义军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虽然失败，但它迫使明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必要措施，如勘察皇庄，对宦官势力也进行了抑制的政策。

二十八、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又称“白莲社”，是混合有佛教、明教、弥勒教等相溶合的一个秘密宗教组织，它起源于南宋的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起初崇奉阿弥陀佛（无量佛），提倡五戒。元代渗入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白莲教在元明清三代成为了农民反对统治阶级的一个组织手段和机构，他们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号召，发动起义。此后，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当时经常活动于京畿地区的白莲教支派有红封、无为、红阳、净空、黄天、龙天、南无、南阳、悟明、金山、顿悟、金蝉、还源、大乘、圆顿、大成、皇姑道、三阳教、罗道教、闻香教和棒棰会等。

白莲教在明代十分活跃，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都有白莲教活动的足迹。在明王朝的心脏北京及京畿之地，白莲教的活动也很频繁。

白莲教在农民战争中，往往起着很大的组织作用和宣传作用。农民们平时利用它来保持紧密的联系。北京地区农民利用白莲教进行反抗活动，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永乐十六年（1418年）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刘化初名僧保，自称是“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并演说“应劫五公诸经”，当时从者日众。随后，真定、容城以及山西洪洞等县民，“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这是明代民间宗教组织在京畿地区活动的最早记录。景泰二年（1451

· 史 ·

年)七月,万宁寺僧人赵才兴自称能通兵法及气候诸将术,与广通寺僧人真海、道人谭福通,以及内使肖保之父肖亮,“刺血誓天,谋欲为乱”。赵才兴自称是宋朝“赵太祖后,推为皇帝。封真海为二王,福通为三王,肖亮为四王”。这是明代白莲教徒与内监交结并谋划起义的第一次文字记载。成化元年(1465年)五月,景州张仲威与宁夏军余赵春,活动于京畿等地。成化十二年(1476年)九月,又发生保定易州李子龙结交内监出入宫禁的重大事件。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一月,发生在白莲教徒田园授千户陈贊为安国公主的事件。此后,白莲教活动更趋频繁,“布满畿甸”。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当宦官四出征税之际,有一千多人在京南农民左文俊的领导下,起义抗拒剿捕的“官军”。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闻香教徒高应臣、郑守忠、李惟仁、齐国泰率领饥民在乐亭迁安一带举行起义。广平府白莲教徒李敬等也聚千人起义。白莲教宣扬的神秘预言,增加了起义农民进行战斗的必胜信心。万历年间永平府滦州人(原籍顺天府蓟州)王森,将受剥削受苦难的农民组织起来。极力倡导闻香教,北京附近的各州县、营路、卫所、乡村、镇店的广大群众,更是“云和响应,顶礼皈依”。教徒不下二百万,“传头半天下”。在各地设立的头目,名称有教头、总传头、传头、会主、会头、卦主、老师傅等,还有老当家等名。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王森来到北京,进行秘密活动,白莲教顿时声势大振。但他在当年被捕,判为死罪。后经人行贿释放,继又入京师传教。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被捕,五年之后死于狱中。他的三子王好贤与弟子徐鸿儒、于弘志继承其教,到各地发展教徒努力日益壮大,人数在二百万人以上。

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在山东领导了白莲教大起义,京南地区的广大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切断江南到京师的运粮道,攻占了山东、河北许多州县。北京的明朝统治阶级十分恐慌,立即派大军前往镇压。

白莲教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是给明统治者以沉重地打击,唤醒了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反抗斗志,成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前奏曲。

· 史 ·

二十九、瓦剌南侵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中的一部分由于长期散居于内地与广大下层人民共同生活，已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逐渐融合，而其余退居漠北者，仍然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共分三部：其中居住在老哈河（西辽河的南源，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西辽河一带者，是兀良哈部；居住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者，是鞑靼部；居住在科布多河和额尔齐斯河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者，则是瓦剌部。明统治者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此三部“分则易治，合则难图”，故一贯坚持了时而拉拢时而打击的分化瓦解政策。

瓦剌部，在成吉思汗时称斡亦刺惕，其牧地原在叶尼塞河上游。术赤北征后，开始臣服于蒙古。元末时又大力向西扩展，尽占阿尔泰山以西地方。当时的瓦剌部，本归元朝旧臣猛哥帖木儿管辖。猛哥帖木儿死后，该部一分为三，分别由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统领。明永乐七年（1409年），因瓦剌三部均曾先后遣使入贡明廷，明成祖便同时敕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不久，鞑靼部首领阿鲁台也派使者入贡明朝。明成祖鉴于瓦剌各部的逐渐强大，因此为了牵制瓦剌，初则又敕封阿鲁台为和林王。马哈木向来与阿鲁台斥和，以此对朝廷大为不满，于是联合瓦剌诸部，拥兵占据饮马河上，准备进犯明朝。

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亲率领大军进攻瓦剌，并告知阿鲁台出兵配合，在忽里忽失温大败瓦剌军（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班达地）。

永乐十四年（1416年），马哈木死，其子脱欢袭位。不久，脱欢又攻杀贤义王和安乐王，尽占其众，统一了瓦剌各部。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脱欢袭杀了阿鲁台，进一步征服统一了鞑靼部。脱欢自立为可汗，因遭各部强烈反对，不得不暂立元室后裔、原鞑靼部首领脱脱不花为可汗，而自任丞相，居漠北，成为实际的掌权者。明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嗣丞相之位。不久，也先又自称太师淮王。北部皆臣属于也先，脱脱不花空徒其空名，不复相制。也先成为整个瓦剌的实际领袖。也先野心勃勃，北征乞儿吉思，

· 史 ·

九四五

西服中亚诸国，西南又攻取哈密，控制了明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又同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联姻结盟，并置“甘肃行省”，破坏明朝在西北的屏障；东败兀良哈三卫，进而席转女真族各部，完成了对明朝东、西、北三方面的大包围圈。

从此，也先开始连续率兵大举侵扰明朝的辽东、蓟州、宣府、大同等各边镇，梦想恢复“大元”的一统江山。与此同时，也先还进一步破坏了同明朝的正常贸易关系，以“通贡”攫取中原大量财物，贡使逐年增加巨额，甚至虚报人数，冒领赏赐。被明廷识破后，给予了严厉的斥责。也先恼羞成怒，便不惜诉诸武力，开始向明朝发动大规模的进犯。与明进行战争已不可避免。但是，明朝由于宦官王振专权乱政，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双方形势，盲目地唆使年轻的英宗皇帝御驾亲征，加以英宗临阵指挥失误，最终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痛失败，明朝国势“土木之变”是由盛到衰的根本转折点。

三十、土木之变

明王朝经过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几朝的经营，国势达到了鼎盛。从正统年间（1436年至1449年）起，国势开始转弱，走下坡路。而蒙古贵族的统治势力，却逐渐强大起来。当时，瓦剌部首领也先，打败兀良哈和鞑靼部，统一了蒙古各部，虽名义上尊元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己只称太师、淮王，但实际上已成为统一蒙古诸部的真正领袖。他在连续征服了中亚、西域和女真等地区后，基本上完成了对明朝的包围，并时刻准备向明朝发动进攻。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也先又派使臣前来贡马。他不仅将2000名使者，诈称为3000名，期望能冒领明政府更多的赏赐；而且，还公然将贡马说成是向明朝公主订亲的聘礼。这种无礼举动，连权宦王振都忍无可忍，宣布决定削减其马价，并警告瓦剌的使者，求亲之事朝廷根本不知，更没有许诺过什么，也不会承担这种责任，请他们休做非分之想。也先闻知大怒，当即于七月初八日，率领四路军兵，大举侵犯明朝。当时北部边防来报，一日内敌军已进占了当里之地，一日数至。王振为了炫耀自己，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竟然鼓